

辨析“李普塞特命题”

——国外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理论之争

倪春纳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重要的研究主题。1959年,李普塞特提出了“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论断,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论断被誉为“社会科学中最杰出的理论发现”和“比较政治学中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经验归纳”。半个世纪以来,“李普塞特命题”经历了众多学者的反复检验。其间,它在倍受称誉的同时,也遭遇了广泛的批评。如有学者质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效应;修正了两者之间的线性因果逻辑;以及提出了民主化的过程取向解释和外生性解释等替代性理论。支持“李普塞特命题”的学者则对各种批评进行了回应,进一步厘清了两者之间的逻辑进路,从而拓展和增进了“李普塞特命题”的理论空间与解释效力。但是,随着现实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有关该主题的争论并未终结而仍在继续。

关键词:李普塞特命题;经济发展;民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5)06-0063-09

An Analysis on “Lipset Hypothesis” —A Review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Western Academia

NI Chun-n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political science. Since Lipset proposed the argument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s democratization” in 1959, this thesis has been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on academic circles,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theor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and “one of the best sustained by the evidenc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Lipset hypothesis” was examined repeatedly during the half a century. It met with fierce criticisms. For instance, some scholars question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revised the linear causal logic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some raised “political process explanation”

收稿日期:2015-09-14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研究”(2015ZDAXM001)

作者简介:倪春纳,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站博士后,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and “exogenous explanation” as alternative theories. Scholars who supported “Lipset hypothesis” responded to the criticisms. Their research mad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more explicit, 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space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Lipset hypothesis”.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re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debates on this issue will continue.

Key words: Lipset hypothe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ocracy

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重要的研究主题。1959年,李普塞特首次从社会学和行为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民主社会条件的理论假设,并通过实证数据加以验证,他发现“民主较多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值要高得多”^[1]。在随后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李普塞特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2]。李普塞特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积极联系的论断,被学术界称为“李普塞特命题”或“现代化理论”,并被誉为“社会科学中最杰出的理论发现”^[3]和“比较政治学中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经验归纳”^[4]²⁷。

一、民主的经济条件

自“李普塞特命题”提出之后,许多学者运用了各种方法来对其进行检验。詹姆斯·科尔曼将75个处于现代化中的政权分为竞争性、半竞争性和专制政权三种类型,同时以11个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他发现,在拉丁美洲和亚非地区每组国家中,竞争性政权国家的发展水平最高,半竞争性国家次之,专制国家的发展水平最低^[5]。布鲁斯·鲁塞特按照科尔曼的政权三分法,将89个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5个等级,发现大众消费水平最高的14个国家无一例外的均为民主国家,在次高水平的国家中,57%为民主国家,而在剩下的三个等级中,民主国家所占的比例介于12%~33%之间^[6]。上述的研究主要沿袭了李普塞特的分析方法,即采用交叉列表的方式给予直观证明。随着社会科学中多变量回归分析的兴起,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菲利普斯·卡特莱特指出,李普塞特没有解释某个欧洲非民主国家在经济指标上高于拉美民主国家的现象;同时他对“民主”的定义不像其他自变量那样可以进行准确测量,也没有区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各种类型。在修正了这些缺陷之后,卡特莱特发现,涵盖各个大洲(非洲除外)的77个独立国家的数据显示(1940—1960),社会经济发展四个方面(通信发展、城市化、教育和工业化)的多重相关与“政治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82^[7]。马文·奥尔森对115个国家的大样本实证研究得出了与卡特莱特相似的结果。奥尔森首先对李普塞特的研究提出批评,他认为后者仅对稳定或不稳定的民主与专制国家的二分法过于简单而主观,同时用于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完全是临时性的。此外,李普塞特使用的样本也局限于特定的范围内。奥尔森对卡特莱特的研究也进行了完善,他认为尽管后者在变量建构上较为细致,提出了更加精确的“政治发展指数”,但是该指数带有浓厚的西式民主偏见。奥尔森的“政治发展”概念则是由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运转、政党组织、权力分散和公民影响力5个维度构成,同时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了更为广泛的14个变量。他的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3^[8]。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将重心放在梳理经济发展带来民主的逻辑进路上。唐纳德·麦克隆等学者认为,城市化提升了教育水平,对民主化产生了直接影响;而教育促进了通信媒体的发展,对民主化有着更为显著而直接的作用^[9]。吉尔伯特·温汉姆在卡特莱特的研究加入了“参与水平”之后,再度证实了通信、城市化、教育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的积极关联。温汉姆肯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确实对民主具有因果效应。但在具体发生逻辑上,他认为,城市化与教育之间可能是互相影响的。美国的案例表明,乡村教育提升了居民的技能与期望,导致了他们向城市地区的迁徙^[10]。亨利·罗恩认为,教育通过两种形式对民主产生作用:受教育的公民能够对政治过程和制度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教育往往间接

地有助于收入水平的提高^[11]。罗伯特·巴罗对100个国家的历时性分析(1960—1995)表明,较高的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民主,两者之间的关联非常显著。“生活水平各类指标的提高可以预测民主的逐步提高;相反,那种没有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政体往往不能持久”。但是,巴罗发现,在特定生活水平上,民主与城市化、对自然资源较大的依赖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城市化与民主的相关系数为 -0.095 ^[12]。

二、对“李普塞特命题”的批判

(一) 现代化的祛魅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回潮同时并存,尤其是在一些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国家,民主化并未像“李普塞特命题”所预言的那样如期发生。巴林顿·摩尔发现,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同模式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才导致民主。摩尔提出了著名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认为强大独立的资产阶级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3]。萨缪尔·亨廷顿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批评,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形成不稳定的进程,即“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强调,“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14]。客观地说,亨廷顿并未完全否认经济发展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依附理论”则对“李普塞特命题”提出了最彻底的批判。依附理论学者认为,经济依附对民主具有强有力的消极影响。西方国家的兴盛繁荣是建立在其他国家欠发达和落后的基础上,处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国家对边缘地带国家的剥削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因,而作为原材料供给者的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真正从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中获益。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前景问题上,经济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是截然相反的。吉列尔莫·奥唐奈根据依附理论对“李普塞特命题”提出批评。他发现,一些南美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民主政体并没有得到维持,而是走向了“官僚威权主义”^[15]。罗丝玛丽·奥凯恩在比较欧洲各国民主化道路时也发现,工业化很难以一种清晰的方式与国家走上或保持民主道路之间发生联系。如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上差异显著,而德国与英国的相似程度远高于法国。在20世纪,德国的工业化导致了纳粹主义,在教育方面,其民主制度发生崩溃时也正处于识字水平最高的时候^[16]。

(二) 因果关联的再审视

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仅存在于横断面的实证分析中,而得不到纵向数据的佐证。如泽拉·阿拉特发现,在1948—1977年间,120个国家中仅有8个国家民主程度的增加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发生的^[17]。达龙·阿塞莫格鲁等学者也发现,经济收入和教育对民主化的影响仅存在于某个跨国横断面上的特定时间点,而不适用于特定国家的历时性变化。其中,教育水平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李普塞特命题”所呈现的那样,既有研究受到了一些从长远来看对教育和民主同时产生影响但又被忽略了“历史发展路径”的影响,如前欧洲殖民地的历史因素。他们指出,正确的研究思路应该探寻,在给定的国家中,随着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增加,其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是否也增加了^[18]。另一些研究在梳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逻辑链条时,发现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联,即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并不能自动增加民主发生的可能性。如罗伯特·达尔认为,社会经济水平可能存在“极限”问题:以1957年的美元计算,在上限(人均GNP为700美元~800美元)之上,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并不会随着GNP的增加而继续提升;在下限(人均GNP为100美元~200美元)之下,人均GNP的变化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19]。迪恩·纽鲍尔对达尔的论断进行了检验。他从拥有投票权的成年人比例、代表的平等性、新闻自由和多元以及选举竞争的程度5个方面来定义民主,析出了23个相对民主的国家样本。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只是“适度关联”,他同时还证实了民主发展的

“门槛现象”,即特定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对民主有促进作用;然而,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该门槛之后,民主将不再是社会经济函数的函数^[20]。罗伯特·杰克曼认为,纽鲍尔的研究样本范围过于狭窄且彼此间的异质性程度很低,这些缺陷削弱了其推论的可靠性。他重新选取了60个相互间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横断面研究,并对变量的测量方法进行了优化,如将“稳定性”从衡量“民主”的指标中剔除,以人均能源消耗来衡量经济发展,结果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线性关联不复存在^[21]。

(三) 过程与结构

现代化理论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结构主义方法,它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22]。与李普塞特等学者的结构取向不同,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试图从政治过程的视角来解读民主化。代表性学者丹克沃特·罗斯托指出,历史上一些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它们无论是在城市化或人均收入上都不符合“李普塞特命题”。他将民主化的完整过程分为准备、决定和适应三个阶段。在“准备阶段”,新精英阶层开始形成并与旧精英发生冲突,两极化而非多元化是这一阶段的突出标志;在“决定阶段”,政治精英接受多元格局的既存事实,并将某些民主程序的重要方面加以制度化;在“适应阶段”,通过多边讨论的基本运作,民主需要反复试验和一段共同学习成长的经历,而首次的成功将鼓励竞争性的政治力量及其领导人通过民主程序解决重要分歧^[23]。罗斯托的研究取向得到一些学者的积极响应。如奥唐奈十分强调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有关键性影响力的政治主体及其选择的重要性。他将民主转型的步骤进行分解,依次为:专制政权的开放→协商→公民社会的复苏→举行选举。其中,奥唐奈格外突出了精英内部冲突和分裂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个转型的开始不是因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威权政体自身的分裂,特别是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决裂”^[24]。换言之,如果缺少精英分裂的前提,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并不必然会导致民主化。胡安·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也反对通过对假说进行检验的方式来探寻民主的起源,他们支持以具体的案例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取向,因为这样可以将关注焦点放在机制和突发性事件上。他们指出,“发展水平和民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告诉我们民主转型会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如果民主转型发生,是否会成功完成转型”“关于经济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常常难以或不可能提出系统性的论断”“有重要影响的人士对于替代方案及体制弊端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合法性信念比经济趋势本身更为重要”^[25]。

(四) 民主化的外生性解释

亚当·普泽沃斯基对“李普塞特命题”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批评。普泽沃斯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内生性”解释,即经济发展增加了发生民主化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外生性”解释,即民主化是由经济发展之外的因素引发,但是民主制度一旦建立之后,经济发展将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普泽沃斯基指出,不论颠覆专制政权的经济发展的门槛是多少,显然许多专制政权安全无恙地跨过了该门槛。即使排除那些税收一半以上来自石油的国家,也只有巴西、捷克、葡萄牙、韩国等少数国家符合“李普塞特命题”。普泽沃斯基批评道,如果“现代化理论”有任何预测能力的话,那么就应能找到那个可以辨识的推翻专制政权的经济门槛,但是事实上却很难发现。相反,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的存活却具有高度的预测能力。以1985年的美元计算(购买力平价),在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民主制度发生崩溃的概率是0.125,即预期寿命是8年;在1000美元~2000美元之间,概率是0.0571,即预期寿命为18年;在6055美元之上,民主制度将无懈可击,永远存活下去^[26]。普泽沃斯基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与响应^①。如瓦莱丽·邦斯指出,民主

①GASIOROWSKI M J, POWER T J. The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Evidence from the Third Wor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98, Vol. 31, No. 6; KOTZIAN P. Public Support for Liberal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 Vol. 32, No. 1; STOCKEMER D, CARBONETTI B. Why Do Richer Democracies Survive? The Non-effect of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0, Vol. 47, No. 2.

化的外生性解释还需要考虑经济绩效、社会经济的平等程度、议会制或总统制等其他因素,同时普泽沃斯基等人所使用的数据仅截至1990年之前,也没有考虑在此之后的许多新生民主国家。如在前苏联国家,经济改革而非经济发展是和民主化最为密切的因素。不过这些并没有削弱其有关经济发展和民主持续性的论断。她发现,在转型之后,最富裕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成为民主制度最巩固的部分,而最贫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则成为有缺陷的民主或是专制体制^[27]。简·图瑞尔根据1972—2006年的全球政权变更数据,对民主化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他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对“第三波”民主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起到了防止政治转型滑向威权主义的作用^[28]。

除了上述的批评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单纯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并不能完整揭示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需要在此基础上做更深入的分析,如引入经济危机变量^[29]。保罗·扎克利用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民主转型的分析显示,民主转型的发生是内生于经济发展或经济收缩过程中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受到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变富或变穷)的驱动^[30]。斯蒂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认为,经济危机会演化为系统性的政治危机,从而开启了以自由化为先导的民主转型窗口^{[4]51}。还有学者指出,即使经济发展确实影响民主化,但是与其他影响民主化的因素相比,并不具有优先性。这些“其他因素”包括过去的民主崩溃、参与国际组织、近期经济表现、自然资源、民族构成、历史遗产、民主扩散,等等^[31]。

三、为“李普塞特命题”辩护

针对依附理论学者对后发国家民主前景的悲观论断,肯尼思·波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的总体回归分析显示,经济发展时机上的先后与政治民主的程度之间不存在显著联系,只有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才能对政治民主程度产生显著影响^[32]。罗斯·布克哈特等学者对阿拉特等人的研究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阿拉特等人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如测量民主不精确;数据没有包括1970年之后的时间段;模型设定错误;静态的分析过程以及没有对因果关系进行检测。布克哈特对1972—1989年间13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在修正分析模型之后,结果再次证实了从经济发展到民主的因果链条。同时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十分显著,人均能量消耗每提升10倍,民主指数就会相应地增长2.5(分值范围是2~14);从世界范围来看,平均能量消耗与平均民主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达到0.82。布克哈特还发现,经济发展对民主前景的影响强度,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随着国家从中心地带向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移动,这种影响在逐渐减弱。不过,即使在边缘地带,两者之间的统计联系仍十分显著。这一发现直接挑战了依附理论^[33]。爱德华·格莱瑟也指出,阿西莫格鲁等学者所强调的欧洲殖民的历史影响,实际来自那些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的移民,后者的发现事实上与现代化理论并不冲突^[34]。

针对“李普塞特命题”在现实中的反例问题,爱德华·缪勒指出,“收入不平等”抵消了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积极效应,它可以很好地解释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民主衰退与回潮现象。在1960—1980年间,收入分配上极度不平等的民主国家全部发生了民主崩溃;中等程度不平等的民主国家的崩溃概率为30%;而相对平等的民主国家中没有民主崩溃的案例^①。塔图·温汉南对170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资源分配的平均程度可以解释高达70%的民主化案例^[35]。从不平等视角来解读民主化发生逻辑的理论流派又被称为“再分配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财富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结果将对民主发生根本性的影响^[36]。代表性学者主要有卡莱斯·鲍什、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等。鲍什将经济平等视为实现民主转型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如果选举中的输赢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条件,民主就会被多数人所接受而成为可能;如果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高度蔓延,少数人拥有多数财富,多数人就会

①MULLER M N, SELIGSON M A. Inequality and Insurgen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7, Vol. 81, No. 2; MULLER M N.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 Vol. 53, No. 1; MULLER M N.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Vol. 60, No. 6.

会试图通过选举掌握政权并实施有利于自身的财富分配政策。面对这种强烈的再分配压力,财富所有者倾向于选择和支持将多数人排除在外的专制政权,以阻止实施高水平的半没收性质的税收政策。除了需要考虑财富的平均程度之外,鲍什认为还应考虑到财富的类型。如果富人的收入来源相对固定,不能转移到国外(如土地、矿产或油井),在面对多数人渴求的再分配威胁时,富人唯一的有效办法就是控制国家机器,来压制反对力量,增加行使自由和进行选举的各种障碍;与此相反,如果财富是流动的,富人可以通过逃往国外来躲避过度征税的冲击,所以会容忍和接纳民主制度。选民也知道资产所有者有退出选择,会克制自身的再分配冲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制度就会得到巩固^[37]。与鲍什的观点略有不同,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经济不平等与民主化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平等的非民主政体很少面临民主化压力,民主最易诞生于那些中度不平等的社会中^[38]。

罗宾逊对以林茨、斯泰潘和奥唐奈等人为代表的注重过程的研究取向提出反驳。他指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充斥着大量关于民主生成与巩固富有深刻见解的案例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何种条件将引导一个社会成为和支持民主制度,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益的理论总结。罗宾逊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许多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拒绝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林茨和斯泰潘主张,宏大政治过程的“历史性”排斥对“非历史”(ahistoric)的社会科学模型进行高度抽象的概括。这种研究取向或许可以解释尽管出现了大量的跨国研究,但是仍对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之间因果机制知之甚少的原因^[39]。约尔·米勒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多数用于反驳“李普塞特命题”案例陆续消失了。如南美洲高度发展的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在二战之后都有十分动荡的政治经历;然而自“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中都得到了巩固^[40]。仁斯基·杜兰斯普利特也指出,强调政治过程的研究,往往没有关注结构性因素是否对当前民主转型的兴起产生了影响。她在确证国家的发展水平对民主化有重要影响的同时,还发现1989年之后,民主国家邻居的存在对民主化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及国家位于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也很重要,与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相比,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更加稳定,发生民主转型的可能性也更低。与布克哈特的观点不同,杜兰斯普利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位于边缘地带、较低的经济增长水平和拥有较多的民主国家邻居,那么它发生民主化的概率就会很高^[41]。此外,尽管也有学者认可从政治过程的视角来分析民主化,但是却得出了与林茨等人相左的结论。如迈克·布拉顿对42个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转型中的共同点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统治者出于个人政治生存的考量,而尽可能长地抵制政治开放^[42]。

鲍什、苏珊·斯托克斯和戴维·艾普斯坦等学者对民主化的外生性解释进行了反驳。鲍什和斯托克斯指出,普泽沃斯基等人的研究存在数量缩减、样本偏差和变量忽略三方面问题。首先,高收入的专制国家很少向民主转型这一观察结果,与民主化的内生性解释并不冲突。高收入水平上专制国家的数量稀少,是因为在某个较低收入水平时,经济发展就已经促使它们转变为民主国家了;其次,普泽沃斯基研究的起始年份是1950年,此时民主与专制国家的分布并不均匀。恰当的检验方式应当将考察时间延伸到民主尚不存在的时间点,然后观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民主化进程;第三,普泽沃斯基还遗漏了资本流动性和国际因素等一些重要变量^[43]。戴维·艾普斯坦等学者认为,鲍什对普泽沃斯基等人的批评过于温和。鲍什提出,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40年代,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影响最为突出。艾普斯坦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影响在二战之后也同样显著。艾普斯坦等人指出,普泽沃斯基忽视了脆弱的或尚未巩固的民主国家,即“部分民主”这种类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数量不仅与日俱增,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们与“完全民主”或“完全专制”的国家在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对Polity IV的指数(从-10~10)进行了划分:专制政权(-10~0)、部分民主(+1~+7)和民主政权(+8~+10),结果再度证实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发生民主化的可能性^[44]。

在“李普塞特命题”中,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的唯一变量是其引发争议的焦点。后续研究对此进行了修正,其中一个重要补充是增加了对文化因素的考量。如李普塞特本人后来承认,经济因素只能解释民主化的部分因果过程,与之相关的非经济影响还包括文化因素,如宗教和价值观等。他对跨国历

史数据的分析显示,文化与民主之间的影响甚至要超过经济对民主的影响^[45]。亨利·罗恩在对“第三波”的研究中发现,经济发展如收入水平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要受到文化因素的限制。如伊斯兰国家中具有显著民主特征的一般都是非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相比,它们的伊斯拉文化气息较淡,如受到西方深刻影响的土耳其;拥有较多非伊斯拉人口的马来西亚,以及本土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的印度尼西亚等。阿拉伯国家多数则直接继承了伊斯兰的重要传统,往往对宗教和世俗权威不加区分。在世俗与宗教权威相分离的国家中,世俗政权受到社会的强烈抵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阿拉伯国家通常都不是民主国家^[11]。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巧妙地将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衔接起来,避免了过分突出政治文化而使其发展成替代性解释的潜在威胁。他的论证始于“行动资源”的概念,行动资源是指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或资源,它会生成“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政治文化,从而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维持与巩固。具体而言,更多的收入、财富和物质资源,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构成了行动资源。这些物质资源和机会提高了个体自主性,意味着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决定自身事务以及支配拥有的财富。随着个体在物质上、智识上、社会上变得愈加独立自主,他们也希望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希望自由高于纪律,自主压倒权威,这些最终导致个体形成了“自我表达价值观”。强调“自我表达价值观”的社会将自我表达放于优先地位;对社会和政治持积极的参与态度;支持性别平等;对外国人、同性恋和其他外来群体相对宽容;以及拥有较高水平的人际信任等。这些因素增加了对政治自由、性别平等以及回应性政府的要求,进而有助于建立和维持民主制度^[46]。拉里·戴蒙德积极肯定了英格尔哈特对民主化的文化解读,指出民主制度确实需要公民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取向。戴蒙德认为,经济发展改变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造成了权力与资源的广泛分散,同时也深刻地转变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朝着民主方向迈进,这些因素都使得某个人、某一政党或少数封闭不负责任的精英所操控的集权体制的维持变得困难^①。戴蒙德还意识到,以往民主转型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往往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内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未考虑到国际因素独立的或相互的影响作用^[47]。

四、结 语

“李普塞特命题”历经半个世纪的洗礼与沉淀,虽然质疑之声一直未曾停息,但是它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被视为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科学发现”^[48]。如芭芭拉·戈迪斯指出,经过对“第三波”民主化20年的观察与分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确信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尽管我们并不知晓个中原因^[49]。自李普塞特之后,大量的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李普塞特命题”。一方面,自变量由逐渐由先前单一的“经济发展”扩展为更为细致的变量,如社会经济平等、种族分化、财产性质、资本流动性等,同时还纠正了将经济发展作为唯一变量的做法,如增加了文化特征和国际环境等变量;另一方面,因变量“民主”也不再是以简单的二分法来进行衡量,对民主程度的研究、政体类型的细化、以及“部分民主”等概念的提出,都使得更为科学和精确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进步极大地拓展和增强了“李普塞特命题”的理论空间与解释效力。客观地说,“李普塞特命题”为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中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认知框架。但是,它在解释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为何发生和没有发生民主化上仍存在局限^[50],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些显著的例外来反证经济增长决定民主实现这个规则”^[51]。此外,鲍什最近在对219个国家的分析发现(1800—2007),自20世纪早期开始,经济现代化的各个变量,如收入水平、经济平等、城市化、教育、对农业的依赖等各变量与民主之间的联系都在减弱^[52]。这表明,随着现实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理论还会继续受到挑战^[53]。同时也意味着未来仍需深入梳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相关性

① DIAMOND L.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1; DIAMOND L.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8: 98.

为何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可以预见,有关“李普塞特命题”的讨论仍将持续。

参考文献:

- [1] LIPSET S M.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 53(1):69-105.
- [2]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3.
- [3] DIAMOND L.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8:95-96.
- [4] HAGGARD S, KAUFUMAN R.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 ALMOND G A, COLEMAN J 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56.
- [6] DIAMOND 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2, 35(1): 450-499.
- [7] CUTRIGHT P.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3, 28(2):253-264.
- [8] OLSEN M 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8, 33(5): 699-712.
- [9] MCCRONE D J, CNUDE C F. Toward a Communications Theory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ausal Model[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7, 61(1):72-79.
- [10] WINHAM G 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Lerner's Theory: Further Test of a Causal Model[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0, 64(3):810-818.
- [11] ROWEN H S. The Tide underneath the Third Wave[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1):52-64.
- [12] BARRO R J. Determinants of Democrac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6):158-183.
- [13] 巴林顿·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 拓夫,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39.
- [14] 塞缪尔·P·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4.
- [15] 吉列尔莫·奥唐奈.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 王欢,申明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63.
- [16] O'KANE R H. Paths to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Totalitarian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226.
- [17] ARAT Z F.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Theory Revisited[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8, 21(1):21-36.
- [18]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From Education to Democra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2):44-49.
- [19] 罗伯特·达尔. 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M]. 谭君久,刘慧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9.
- [20] NEUBAUER D E. Some Social Conditions of Democrac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7, 61(4): 1002-1009.
- [21] JACKMAN R W. On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Democratic Performa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17(3):611-621.
- [22] GUO S, STRADIOTTO G A. Democratic Transitions: Modes and Outcom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18.
- [23] RUSTOW D A.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0, 2(3):337-363.
- [24] 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 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M]. 景威,柴绍锦,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24.
- [25] 胡安·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共产主义欧洲[M]. 孙龙,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82.
- [26] PRZEWORSKI A, LIMONGI 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J]. *World Politics*, 1997, 49(2):155-183.
- [27] BUNCE V.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Big and Bound Generalizations[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0, 33(6):703-734.

- [28] TEORELL J. 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zation: Explain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World, 1972–2006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6.
- [29] 王金红, 戴奔利.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民主理论研究的影响[J]. 学术研究, 2014(1): 28–34.
- [30] ZAK P J, FENGY.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3, 52(1): 1–25.
- [31] BROWN N J.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Dictatorship,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3–174.
- [32] BOLLEN K 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Timing of Development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9, 44(4): 572–587.
- [33] BURKHART R E, LEWIS-BECK M S. Comparative Democrac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is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 88(4): 903–910.
- [34] GLAESER E L.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4, 9(3): 271–303.
- [35] VANHANEN T.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0 Count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89.
- [36] 汪仕凯. 西方民主发生理论辨析 [J]. 政治学研究, 2015(2): 104–115.
- [37] BOIX C. The Roots of Democracy [J]. Policy Review, 2006, 135(2): 3–21.
- [38] 达龙·阿塞莫格鲁, 詹姆斯·罗宾逊.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 [M]. 马春文, 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164–170.
- [39] ROBINSON J 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6, 9: 503–527.
- [40] MOLLER J, SKAANING S.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01.
- [41] DOORENSPLEET R. The Structural Context of Recent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4, 43(3): 309–335.
- [42] BRATTON M, WALLE N V.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3.
- [43] BOIX C, STOKES SC.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J]. World Politics, 2003, 55(4): 517–549.
- [44] EPSTEIN D L, BATES R, GOLDSTONE J. Democratic Transi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6, 51(3): 551–569.
- [45] LIPSET S M.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4, 59(1): 1–22.
- [46] INGLEHART R, WELZEL C.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12.
- [47] STONER K, MCFAUL M.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 [48] ELGSTROM O, HYDEN G.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How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91.
- [49] GEDDESB.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 115–144.
- [50] HAYNES J. Routledge Handbook of Democratiz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49.
- [51] 卢西恩·W·派恩. 民主及其敌人 [M] // 詹姆斯·霍利菲尔德, 加尔文·吉尔森. 通往民主之路: 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何志平, 马卫红,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3.
- [52] BOIX C, MILLER M, ROSATO S. 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 1800–2007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3, 46(12): 1523–1554.
- [53] 刘瑜. 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 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衰落与复兴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4): 16–25.